

● 中华全景百卷书

巨著系列

69

中国古代 史学名著

徐庆全 张伯芸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



中华全景百卷书

○巨著系列○中国古代史学名著

徐庆全 张伯芸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 委 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 星

总编委员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 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马艳平	王 红	王 伟
王 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 达	刘 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襄
刘森财	成绶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汪家兴	张 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绶祥

陆道中	武 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 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 时	空 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 昌	胡 洁	胡振宇	郝 旭	春 晖
钟 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 冶	浦善新
唐 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 超	葛晨虹	鲁 威	焦国成	曾令真
谢 军	邵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伸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吕

装帧设计：王 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任白斌 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徐庆全

主旋律的音符

(总 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在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 100 卷分 10 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 100 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 100 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 100 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 45 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目 录

上篇 导读语: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脉络 …	(1)
下篇 名著介绍	(14)
第一节 编年体史籍	(14)
一、《春秋》.....	(14)
二、《资治通鉴》(附《资治通鉴音注》)	(19)
第二节 纪传体史籍	(29)
一、《史记》.....	(29)
二、《旧唐书》.....	(40)
第三节 纪事本末体史籍	(46)
《通鉴纪事本末》	(46)
第四节 典章制度体史籍	(56)
《通典》	(56)
第五节 历史评论体史籍	(65)
《史通》	(65)
第六节 考史体史籍	(73)
《廿二史考异》	(73)

第七节 学案体史籍	(77)
《明儒学案》	(77)
第八节 其它类史籍	(87)
一、《尚书》	(87)
二、《四库全书总目》	(92)
附录 中国古代主要史籍目录	(98)

上篇 导读语：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脉络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发展源远流长，先秦时期是它的起源阶段。

我国史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口头传说时代。早在氏族公社时代，氏族成员的血缘纽带，是靠图腾崇拜而维系的，因此，有关图腾的来历故事，在氏族成员中代代相传。后来，祖先崇拜逐渐取代了图腾崇拜，氏族成员中又代代相传始祖的故事。由于那时还没有产生文字，这些氏族的历史没有成文记载，只能靠代代的口头流传。这些口头流传的故事，后来被整理成为古代神话传说和史诗，成为研究原始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因此，我们说口头传说时代是史学的萌芽时代。

夏朝建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也相应地发达起来，并进而产生了文字。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当时已经用于记录国家的大事。西周到春秋时代，周王室和一

些文化发达的诸侯国的史官，他们记载本国的历史，并编辑成书，晋称为《乘》，楚命名为《檮杌》，宋、鲁、齐、燕等国通称为《春秋》。据史书记载，孔子曾翻阅过一百二十国宝书，墨子也曾见过百国的《春秋》，可见当时史书编著还是很盛行的。从此，史学摆脱了原始的口头传说时代，进入了有成文的历史记载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不仅官修史书，私家修史之风也蔚然兴起，孔子所作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私家著述的史书。私家著史风气的兴起，不仅保存了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创立了修史的方法，并在思想观点上给后代史家以深远的影响。

先秦史籍的体例，开始时只有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纪事体，和以《尚书》为代表的记言体两种基本形式，此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书写条件的改善，便产生了内容更加丰富繁杂的编年体史书。这种史书，以时间为线索，记事为主，杂以记言，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对史实能够作比较完整的叙述，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左传》，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最早的代表。

战国至两汉时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作为

观念形态的历史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前221年(始皇嬴政二十六年),秦始皇灭掉六国,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汉朝建立后,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时期,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家空前强盛。汉武帝为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强盛,在武力治国的同时,还广泛借鉴古代的统治经验。他派人搜集整理古代的史册,还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汉武帝“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两汉史学的发展,为“正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史学的两大发展特点:

第一,纪传体史书的创立。所谓纪传体,是一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的编纂体例。这种体例的产生,是与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确立相适应的。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所以历史的记载,也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这样便产生了这种以帝王为纲,以其他人物活动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为辅的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的创立,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班固的《汉书》。前者是纪传体通史,后者是纪传体断代史。这种体例产生后,即被封建统治者列为

“正史”，这标志着封建史学在秦汉期间已经确立。

第二，与先秦史学相比较，史书的记载范围也扩大了。先秦时期的史著，如《春秋》、《左传》等所记载的内容，或是局限于某些地区，或是局限于政治和军事，而秦汉时期的史学名著《史记》和《汉书》，在记载时间、地域和内容上，都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部史著。《史记》在时间上，上起传说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在地域上，不仅记述中国的，也记载外国的；在内容上，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都兼容并蓄。《汉书》虽然是纪传体断代史，记载的时间也仅限于西汉一代，但是它记载的内容和地域，却承接了《史记》的特点，并增补了大量的内容。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是封建史学的中期阶段，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史学特点及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学从经学中分化出来，史籍独立成为一大门类。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期统一外，分裂状态将近四百年。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表现异常尖锐。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各族建立了 23 个割据政权。这些政权，几番更替，此起彼伏。这种复杂多变而又丰富的社会现实，为史书的撰写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

因此,这一时期的史著数量,随着历史的急剧变化而大大增加。从另一方面讲,魏晋以后,由于玄学、佛学的兴起,经学逐渐走向末路,学术领域冲破汉儒经学的束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史学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书,存佚合计达4757种、49467卷,其中史部书,存佚合计即占867种、16558卷。说明魏晋南北朝的史籍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所编写的后汉历史有12家,三国历史有20余家,晋史有23家,十六国史有30家,南北朝史有19家。史著的门类也在不断地扩大,《隋书·经籍志》将这一时期的史籍分为13类,除了纪传史、编年史之外,还有杂史、地方史、杂传、典志史、谱系、地理、起居注等等。可见,当时史籍数量之多、体例之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早在两汉时期,史学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但是,在《汉书·艺文志》中,仍将史籍附属在“六艺略”之内,还是处于次要地位。到了这一时期,史籍在数量上已大大超过经籍,史学便从经学中分化出来,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隋书·经籍志》专门立了“史部”,成为“四部”(经、史、子、集)中位居其二的一大门类。

第二,官修史书的规模逐渐扩大,并渐成定

例。我国官修史书的制度,大约开始于东汉明帝时期。《东观汉记》一书,是我国最早的官修史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奉诏设馆修撰史书的情况就比较常见了。但是,自汉至唐初,虽有设馆修史的事实,还没有成为有职守有组织的定型机构。中国历史上正式设馆修史制度,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建立的。唐代初期,鉴于隋朝灭亡的教训,“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成为唐初统治者的主导思想,他们想通过对历代兴亡盛衰历史的了解,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作为巩固自身统治的借鉴。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就下诏撰修前代史,但是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项工作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才全面展开。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担任总监,秘书监的魏征为修史书的总负责人,令狐德芬担任总裁,开始了大规模的撰修前代历史的工作。在史馆的便利条件下,十余年间,先后撰成周、北齐、梁、陈、隋、晋等史书。从此,官修前代史成为每个新朝代的惯例,直至明清相沿不改。正因为如此,我国保存了一整套未曾间断的“正史”,即纪传体的《二十四史》

第三,开辟新的史学领域,创立新的史学体例——历史评论体、典制体和纪事本末体。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和趋向繁荣的时期,随

着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史学家的视野也在不断地扩大，在此前史学的基础上，又开辟了新的史学领域，并产生了历史评论体、典制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史书形式。

历史评论，是专就史事、史书或史学进行评论或论断的一种体裁。历史评论较早出现的是对史事的评论。西汉贾谊写有《过秦论》，东汉班彪写有《王命论》，唐代朱敬则写有《十代兴亡论》，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史事评论。但这些都还是史事评论的单篇，而不是史事评论的专书。宋代以后，关于史书评论的专书才不断出现。宋范祖禹撰修的《唐鉴》，论述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的得失成败，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孙甫的《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李涛的《六朝通鉴博议》，都是这类著作。在历史评论体中，还有评论史学和史书的专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这就是唐代刘知己撰写的《史通》。《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它的产生，不但反映了我国唐以前史学发展的状况，而且开启了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先河，对于推动我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典制体史书，系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它是纪传体史书中书志的发展，是从纪传体中

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体裁的。我国封建社会由秦汉至唐代,封建制度经历了由确立到逐步完善的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也在日益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典制体的研究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唐代中期,由杜佑编撰的,我国第一部典制体史书《通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此后,这种典制体也为后人所沿用,宋代郑樵撰成《通志》,元代初期,马端临又作《文献通考》。由于这三部书都注重记述研究历史典章制度的演变,后人将其合称为“三通”。“三通”的产生,是这个时期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的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的以传人为主,它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详其首尾,完整地进行表述。前文我们讲过,编年体和纪传体是我国史书的两种重要体例,但其自身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点。纪传史“一事而复见数篇”,而编年史则“一事而隔越数卷”。由于这两种体裁有这种缺陷,所以自南北朝以后,就出了纪传、编年孰优孰劣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提出了对史实作比较完整叙述的撰述思想,成为史书撰写的新课题。这个课题,由南宋史家袁枢完成了。袁枢依据《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排比史事,创立了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

体,完成了《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纪事本末体的创立,既使历史编纂学更加完备,也反映宋代史学的发展。

第四,编年体史书的进一步发展。编年体是一种古老的史著体,但在秦汉时期纪传体产生后,则逐渐取代编年体而成为史学撰述的主要体例。魏晋至隋唐,由于封建统治者诏修前代史,并以纪传体为“正史”而独尊,编年体几乎被挤出史坛。这种情况,直至两宋才有所改变。两宋期间,史家纷纷修撰编年体史书,产生了大量的著作。其中,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代表,将编年史体例推向高峰,成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自此以后,编年体史书又得到发展,又产生了一批史著,有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这样,宋代成为我国古代编年史发展的全盛时期。

明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皇权高度集中。在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生产关系,因此,明清之际出现具有启蒙性质的民主思想。学者们强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学术领域呈现了较为活跃的气氛。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在学术上实行文化专制